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陈海宏 等 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1760—1914) 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1760—1914)

下

[英] 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2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1760~1914/(英)曼(Mann, M.)著; 陈海宏等译. —

2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ISBN 978-7-208-13122-4

I. ①社… II. ①曼… ②陈… III. ①权力-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7331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陆智昌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

[英]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等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58

插页 8

字数 791,000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2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122-4 / C · 494

(上下册)定价 13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下

目录

- 第十一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一): 定量统计资料/393
- 第十二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二): 军事权力的自治/437
- 第十三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三): 官僚机构化/486
- 第十四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四): 民事机构的扩展/527
- 第十五章 英国工人阶级抵抗的兴起, 1815—1880 年/561
- 第十六章 中产阶级国家/604
- 第十七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 1880—1914 年(一): 英国/660
- 第十八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 1880—1914 年(二): 工人
阶级运动的比较分析/695
- 第十九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 1880—1914 年(三): 农民/762
- 第二十章 理论总结: 阶级、国家、民族及社会权力的来源/796
- 第二十一章 经验主义的巅峰——超越巅峰: 地缘政治、阶级斗争和第
一次世界大战/815
- 附录: 国家岁入及雇佣状况的附加表/884
- 译者说明/899

第十一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一): 定量统计资料

现代国家的兴起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的老生常谈,然而对它的分析却很不充分。国家现代化包括着四个发展过程,这四个过程指:国家的规模、其职能的范围、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争取代议制的斗争通常与其他三个行政进程分开,被认为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全面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持续不断,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例如 Beer, 1973, pp. 54—70; Eckstein, 1982)。1863年,阿道夫·瓦格纳系统陈述了现代国家持续扩张的“法则”,并且这现在仍影响着统计学家在国家预算中对那些大规模的预算进行慎重的考虑(如 Andic and Veverka, 1963—1964)。现代国家的发展被描述为是“向前和向上”的演化进程。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着重研究过20世纪一些现成的财政统计数据,他们以职能和多元的方式来解释发展。希格斯(1987)把他们的理论区分为四种模式:现代化理论(国家发展到与更为社会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相协调),公共财产理论强调民族防御(公共财产是由国家提供的,因为它们不是以私人的利益而是以公众的利益来投资,而且一个消费者的获益并不减弱其他消费者的获益),福利国家理论(在复杂的社会中市场削弱了私人救济和国家介入),政治再分配理论(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获取利益)。希格斯指出20世纪美国的发展不适合所提到的这四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其发展得到了三次剧烈危机即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推动。这些危机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向国家干预的方向偏移(皮科

克和怀斯曼在 1961 年对英国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这与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相结合(从真正精英国家理论借用的一种理论),并且阻止着政府组成回复到低层次化。

在扩张国家中战争扮演的角色已很古老,但它是否能被归入更为一般的“危机”概念是有争议的(拉斯勒和汤普森在 1985 年也提出这一观点)。或许与战争相分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发生在 1850 年之前。但它们并没有刺激国家的增长,1850 年前只有战争起到了这一作用。政治干涉者对大萧条的反应看起来是独特的,而不是一般现象的一部分。下层社会阶级提出了被马歇尔称为“社会公民权”的要求,这在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除战争之外,19 世纪的国家发展并不是对危机的反应。值得称赞的是,希格斯承认了这一点并总结道:“大政府的发展无论它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和多维的,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动力是‘更为混乱’的,与理论家所设想的相比,对外生的影响或震动更为开放,在他们的结果上具有较少的决定作用”(1987: 259)。他是正确的。他的四种国家发展理论囊括了所有多元国家理论的缺点。国家不能系统地反映他们的社会;他们也不是简单地实行一个基本的现代化、公共财产、福利、再分配,或者甚至是危机职能。他们也不能系统地反映一场辩证的阶级斗争或国家精英的利益。而是这些他们都做到了——并且进一步——置身于机构和职能的错综复杂中,这需要细致地进行分析。

韦伯也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国家发展理论:它是整个西方纵横几个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合理化进程”的一部分。他害怕规模和范围不断增长的官僚国家“高高在上”的权力,并且他也简短地指出了这种国家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原因:对一支现役军队和整齐划一的法律和税收的联合需求,资本主义企业对统一技术和可预测服务的需要,公民权要求对待一致性所产生的压力。这是敏锐的,但韦伯却把这种分析从属于一种本质上向前向上的发展历程(尽管他也不确定是否喜欢它的结果)。

真正的精英国家理论(见第三章)也从本质上讲了一个向前向上的发展故事。在波吉(1990)看来,这是被国家本身的“侵略”倾向推动的,尽管也与阶级和多元机制以及一些附加的偶然性相互作用。斯科克波(1979)提供了一个更缺乏逻辑性的真正精英理论。她认为1789年以来的革命同时促进了国家的规模、范围和官僚主义(希格斯危机理论的另一种版本)。(我在第十三章中对她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吉登斯把韦伯和福柯(1975)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描述了一个独揽大权的、全面监督和控制民族国家的兴起,他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权力容器”。它“吸纳”了社会并实际上就“是”社会(1985, pp.21—22, 172)。但是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集权国家在何时何地出现。他或者福柯也没搞清这个集权国家叫什么?谁控制它?谁应为它做什么?事实上是否有个国家精英在掌管着它?

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考虑给出了一个向前向上的解释。他们指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而是一种曾经扩张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着重地分析国家,但他却用维多利亚时期反对“过于膨胀的官僚机构”的冷嘲热讽对法国和德国进行了描述。他把法国描述为“这个骇人听闻的寄生体,像网一样缠住了法国社会的机体,并阻塞了它所有的毛孔”(1968: 169)。这一章的图表表明法国并不比同时期其他的欧洲国家大。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一成不变地写着“资本主义国家”。米利邦德(1969)的书是这样开头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和行为的高度膨胀……已成为政治分析纯粹的最司空见惯的一种。”他的书名是《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了他对这种膨胀的解释。沃尔夫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把发展和官僚主义归因于集中的资本需要,以使用可预测的、合理的公共财产和一种明显的中立机构来控制阶级斗争并通过福利改革来缓解它(1977, pp.59—79, 263)。他的历史,几乎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很少提到国家的军事活动。

这种向前向上的历程描述反映了国家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发展的可信

度。一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在经过整理后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如 Poggi, 1990, pp.109—111)。有人提到国家官员在数目上持续不断的增长时(如, 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 经常引用弗洛拉(1983)关于公共就业历史统计的汇编。布鲁斯·米切尔(1975, 1983; Mitchell and Deane, 1980)有价值的财政汇编也经常被引用。他们指出整个这一时期,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现金支付大幅度增长。财政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当进一步宣称, 国家花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 尽管它在整个 19 世纪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张(1975, p.221)。在简略地阐明了统计学的两种类型并承认了 19 世纪发展的某些不均衡性后, 格鲁(1984)转向了他的主要问题: 在 19 世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程度的国家扩张? 并且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性? 格鲁对国家的一味发展看起来是信心百倍的。

但情况真是如此吗? 在本章里, 我在国家财政和就业方面列举了系统的大量资料, 把规模、范围和官僚主义细致地区分开, 以研究哪一些增长了, 它们又是在何时何地增长的。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情形迥异、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的进程。更令人称奇的是, 在“漫长的 19 世纪”中, 国家就其国内社会而言, 并没有变得更大。然而这一趋势的缺乏使得三种进程相混淆——一支衰落而日益离散的军队, 官僚作风日渐膨胀和平民范围的极大扩充。关于这三个进程我将在它们各自的章节中分别对其分析论述。

我已收集了五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规模、范围和官僚制度方面的系统化资料——低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层次的所有的政府层次。在奥地利国土上, 1867 年前的“中央政府”仅仅指的是维也纳政府; 1867 年后, 它指的是二元君主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两个王座。在第一卷中我扩充了方法论, 以使用它们产生的统计资料为国家讨论提供基础。税收和支出总数也象第一卷中那样进行分析。税收为我们提供了国内社会国家和权力运作者关系的线索, 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它与国内社会权力网络隔离或相融合(这些概念在第三章已给出解释)。支

出反映了国家的职能，它给出了国家总体规模和其职责相对重要性的财政索引。由于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我对这些财政数据进行了调整，并把它们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以衡量国家经济的规模。

在现代我们能在国家就业上增加统计资料。官员数量也可以看作是国家规模的检测尺度，并且还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人事部门的数据已被证明是极不可靠的——实际上，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官僚机构的胜任能力而不是规模。我在第十三章将进一步讨论人事部门的资料，以阐明官员的就业情况、他们的职责、组织网络和社会背景——揭示他们作为精英或官僚以及隔离或嵌入国内社会的均衡性。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些数据称作“统计学”而没有丝毫的不合时宜，因为这个词和它的同源词出现在 1800 年前的英语和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其意义是与国家有关联的数据——揭示国家现代化还在进行当中。

这一卷将会讲述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自相矛盾的历程。一方面 19 世纪已看到了一个理所当然应被称作现代的国家的出现——不比其公民社会庞大，但却承担了更多的国内职能，准代议制也变得更为集权化、官僚化和能人制度化，其基础结构也能有效地渗透到它所有的领辖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并不是划一的，而是多形的，在每个阶段适应不同的政治定型。这在基础结构上导致了一个政权，并肯定不如它的前任具有协调性。

国家的规模：支出倾向

我首先把支出倾向作为整体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费的金钱越多就意味着国家越发展吗？

表 11.1 包含着可利用的支出数据，它是以当前的价格，按 19 世纪中期国家的货币来衡量(几个国家在这一时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对

于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数据从一开始就是适用的；而对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却是从 1790 年，即它建国后才开始适用的。奥地利的数据需仔细斟酌，因为它们有时指的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而有时仅指西半部(奥地利帝国仅包括总人口的 60% 强)。地方政府很少被连贯地记录下来。英国的地方当局、法国的各个部和公社、德国的联邦州和乡镇的数据以及对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估计，贯穿 19 世纪中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适用的。奥地利的一些地方数据在世纪末变得适用起来，但我坦白，我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结构，于是就删去了。

像本章提供的所有数据一样，支出数据也将有所保留。后期的数据比前期的数据更加可靠，而且中央政府的数据比地方的数据更为可靠。一般来说，在这些幸存下来的统计的意义和准确性上，我会听从专业历史学家的建议。我并没有宣称这些数据是完全准确的；也不可能这样。然而，我只是宣称它们是这一时期所汇集的资料中最为全面的。

从金钱这方面来说，所有的中央国家都发展迅猛。1760 年，英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花掉了 1 800 万英镑；1911 年，它几乎花掉了 1.6 亿英镑。法国也同样发生了 8 倍的增长。其他国家的增长幅度甚至更大：奥地利和普鲁士—德国几乎增长了 40 倍(应该考虑到的事实是，从 1870 年起，在表 11.1 中的奥地利数据仅指奥地利帝国)；并且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骤然增长了 200 倍还要多(从一个很小的数据起)。

如加上地方政府的数据会使发展加速，但这较难解决。在这一阶段早期是存在地方政府的，但无论我们还是同时期的中央政府都无法知道它的规模或花费，因为它是高度自治的(后边会讨论一个重大发现)。那部分已知的地方政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说明的，对中央政府而言它开始很小，然后在这一阶段后期比中央政府发展得都要快。地方政府的开支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就下降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所有政府的开支(中央加上地方的)应该增到甚至超过表 11.1 所给出的数据。

表 11.1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全部支出，
1760—1910, 当前的价格

年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百万弗罗林	百万马克		百万法郎		百万英镑		百万美元	
1760	58	61		506		18.0			
1770		51		333		10.5			
1780	65	64		411 +		22.6			
1790	113	90		633 +		16.8	23.0	4.3	
1800	167	106		726		51.0	67.0	11.0	
1810	216			934		81.5	94.0	8.7	
1820	160	201		907		57.5	70.0	19.3	27.7
1830	138	219		1 095		53.7	65.0	17.0	33.1
1840	165	204	234	1 363		53.4	64.0	28.9	67.6
1850	269	252	334	1 473		55.5	66.0	44.8	89.2
1860	367	323	496	2 084		69.6	87.0	71.7	171.7
1870	332	1 380	2 360	2 482	3 348	67.1	92.0	328.5	611.7
1880	432	519	1 851	3 141	4 180	81.5	112.0	301.0	621.1
1890	560	1 044	2 690	3 154	4 289	90.6	123.0	378.9	854.1
1900	803	1 494	4 005	3 557	4 932	143.7	265.0	607.1	1 702.1
1910	1 451	2 673	6 529	3 878	5 614	156.9	258.0	977.0	3 234.0

注：所有的政府 = 联邦政府 + 州政府 + 地方政府。在所有的表中，对美国而言，1900 年实际上是指 1902 年，1910 年是指 1913 年。

资料来源：

奥地利：中央政府正常和额外的纯支出：

1760 Janetschek, 1959, p.188。

1780—1860 Czoernig, 1861, pp.123—127(在这些表和以下的表中，1780 年实际上是 1781 年，1860 年实际上是 1858 年)。数据指的是整个奥地利帝国。

1870—1910 Wysocki, 1975, p.109; 奥地利帝国支出了奥匈帝国二元君主政体约 70% 的财政收入)。匈牙利的数据未能找到。

在 1858 年，100 个旧弗罗林约等于 105 个新弗罗林。在这些表中中和以下表中我都没有调整这个数据。

普鲁士—德国：在这些表和以下表中相邻年份是：1821，1829，1852，1862，1872，1881，1892。

1760—1860：普鲁士中央政府的数据和 1870—1910 年间的所有德国政府的数据；Riedel, 1866, 表 xv—xx; Leineweber, 1988, pp.311—321; Weitzel, 1967, 表 1a。值

得注意的是, Andic and Veverka 在 1963—1964 年间给出的地方政府的数据比 Leineweber 和 Weitzel 给出的在某种程度上高一些。

1870—1910 德国中央政府的数据: Andic and Veverka, 1963—4。

法国:

1760—1770: Riley, 1986, pp.56—57, 138—48, 1761 年和 1765 年份的资料。

1780—1790: Morineau, 1980, p.315——一般的支出仅指 1775 年和 1788 年, 比全部支出的数额要低估一些(因为在这两年未发生战争)。

1800—1810: Marion, 1927, IV, pp.112—113, 325; 指 1799—1800 年(共和国 7 年)和 1811 年。

1820 Block, 1875, I, pp.495—512。

1830—1860 1913 年法国统计年度回顾摘要, p.134。

1870—1910 Delorme and André, 1983, p.722; 1870、1900 和 1910 实际上分别是 1872、1902 和 1909。

英国:

1760—1910 中央政府: Mitchell and Deane, 1980: 公开财政表; 到 1800 年是净支出, 然后是毛支出。

1790—1910 地方政府: Veverka, 1963, p.114; 指的是英国并包括爱尔兰。由于 Veverka 没有给出资料参考, 我也无法核对它的出处。他的人口数据不准确。在所有表中 180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01 年的。

美国:

1790—1910 中央(联邦)政府, 1790—1910, 和所有地方政府, 1900 和 1910: 1795 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局: 表 Y350—6。这种标准化的来源包含的仅是邮政利润。我已经从美国减去了这一部分并增加了全部的邮政支出。财政部 1947 年, 419—422。

1820—1890 州政府 1820—90, 从 Holt 1977 年的资料计算出来的。Holt 不完全的州资料被转变成按人口计算的数据, 然后被集中到全部的美国人口中。

1820—1890 地方政府, 1820—90, 来自 Legler 等人 1988 年的计算。表 4 和 Legler 等人 1990: 表 3。注意(a): 这是全部的收入数据, 而不是支出数据; (b): 我已经估计了 1820—1840 年间的数据, 认为在 1820 年所有地方政府的人均收入是城市平均收入的 8%, 1830 年的 9%, 1840 年的 10% (已知的比例是 1850 年 12%, 1860 年 16%, 1870 年 21%, 然后缓慢地连续上升)。这些数据因此只是大约的估计。

像这样的数据为向前向上的历程提供了主要证据, 然而它们并不是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 它侵蚀了这一时期所有的货币价值, 并且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快速的人口增长, 尽管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普鲁士—德国和美国, 因为它们的领土扩张了或有大规模的移民。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支出增长, 那么一个国家实际控制其国民的能力就削弱了。在表 11.2 中我既考虑到了通货膨胀, 又考虑到了人口增长, 以固定不变的价格把支出占 1911 年人均水平的百分比表达了出来。

表 11.2 以固定不变的价格所表现的按人口计算的国家支出趋势,
1780—1910, 中央国家和所有地方政府 (1910=100)

年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普鲁士—德国		奥地利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1780			70						
1790			45	32	12		63		
1800			74	51	14		86		21
1810			96	61	9				19
1820	27		77	50	18	8	94		19
1830	31		76	48	14	8	80		14
1840	35		68	42	16	13	68	32	19
1850	43		87	53	22	14	82	46	25
1860	50		86	57	23	18	69	44	25
1870	67	63	69	50	57	35	118	83	35
1880	85	81	71	67	56	37	32	48	41
1890	92	89	75	63	68	51	63	66	54
1900	99	96	103	118	91	80	78	86	72
19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支出来源和注释同表 11.1。以下是固定价格的来源。

法国: Lévy-Leboyer, 1975, p.64。1908—1912 年的价格。

普鲁士/德国: 1790—1860, 普鲁士; 1870—1910, 德国。1790 年实际是 1786 年; 1800 年是按 1804 年的价格计算来的。1820 年实际上是 1821 年。

1790—1800 Weitzel, 1967, 表 1a。

1820—1910 Fischer 以及其他等人 1982, pp.155—157。1913 年的价格。

英国: 1780—1840,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3, p.41——他们对“南部城市最好的推测”价格指数——与 1850—1910 相接, Deane, 1968。这两个指数在 1830—50 相交叠的阶段仅有轻微出入。

美国: 美国人口调查局 1975 年, 表 E52—89。Warren, Pearson 在 1790—1890 大规模的价格指数与劳工统计局 1890—1910 年的指数相衔接。

奥地利: Mühlpeck 等人: 1979, pp.676—679。1914 年的价格。

这两种限制抵消了很多的国家发展, 尽管是按照国家和政府水平来区分其发展程度的。按真正的人均标准来看, 地方政府的增长比中央政府延后, 但却迅速, 只有法国是个特例, 它的两种增长率并没有明显差异。法国和奥地利的增长是卓有成效和稳定的。这一时期英国和普鲁士的中央政府实质上经历了停滞, 并且在世纪中期后宣称处于衰落;

但它们的地方政府的增长是相当可观而又稳定的。在美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百年不遇的向上的温和倾向,由于内战的巨大推动力,数据急剧增加扩大。我将在后面解释这些各自的倾向。现在我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发展尽管不尽相同,但却是真实可靠的。在本世纪,按照它们的支出来衡量,国家的确是变强大了,尽管不是气势恢弘;并且区域性国家的增长要比中央国家的增长迅速得多。

但我要增加第三种限制。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实际上集中于我们要讨论的五个国家。这样它们的经济增长就应该走在国家发展的前头,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在实际上都有所下降。

表 11.3 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中的百分比,1760—1910

普鲁士—德国		英 国		英 国		奥地利		美 国		法 国		法国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		国民生 产总值		国民生 产总值		国民生 产总值		国民生 产总值		商品 生产	
年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a	b	a	b								
1760	35		22							12		16	
1770	23		11							7		9	
1780	22		22				17			8			
1790	24		12		16		27	2.3		12		13	
1800	23	19	27	29	36			2.4		9		12	
1810		27	37	31	43			1.5		10		14	
1820	19	20	23	24	28			2.9	4.2	7		14	
1830	17	16	19	19	23	12	15	9	1.8	3.5	7	12	
1840	12	14	12		14	11	13	9	1.7	4.0	8	12	
1850	9	12	10		13	10	12	11	1.7	3.4	9	13	
1860	8	12	11		13	9	10	11	1.9	4.5	9	13	
1870	15	18	7		10	6	9	11	4.5	8.3	10	13	14
1880	4	13	8		11	6	9	12	2.9	5.9	13	16	18
1890	5	13	7		10	7	9	13	2.9	6.5	14	18	19
1900	5	14	9		16	8	14	15	2.8	7.9	12	16	19
1910	6	16				7	12	17	2.5	8.2	11	15	15

注: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了国民收入约15%,超出了商品生产约25%。

资料来源: 支出来源和注释同表 11.1 一样。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商品生产。

普鲁士—德国:

1760—1800 Weitzel, 1967, 表 1a, 在资料遗失的年份是用他的预测。

1820—1910 Leineweber, 1988, pp.311—321——在生产要素费用方面的国民收入。

美国: 全部年份: Mitchell, 1983, pp.1886—1889(国民生产总值)。

奥地利:

1780—1790 国民收入: Dickson, I, pp.136—137——估计 1780 年的国民收入为 3.57 亿弗罗林(他估计范围的正中点), 1790 年为 4.1 亿弗罗林。我没有采用 Dickson 自己的百分比估计。它们只是通常和平时期的收入, 比实际支出要低一些。

1830—1910 奥地利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Kausel, 1979, p.692。我已经计算了 1830—60 年间柴厄尼格支出的 70%。1867 年帝国分裂后, 奥地利提供联合预算的 70%, 匈牙利提供 30%(1908 年, 匈牙利提供的预算上升到 36.4%, 但我并没有调整 1910 年的数据)。

英国: 国民收入估计: (a)Deane and Cole, 1962, p.166; (b)Crafts, 1983——推测了 1770、1790、1810、1820、1830—191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Deane, 1968, pp.104—105。

法国: 国民生产总值 1760—1790: Goldstone, 1991, p.202。国民生产总值 1800—1810 (实际上是从 1781—1790 年和 1803—1812 年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Markovitch, 1965, p.192。1788 年的支出来自 Morineau, 1980, p.315; 1820—1910 的来自 Lévy-Leboyer, 1975, p.64。商品生产 = 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市场价值(即不包括服务业)。1740—1767: Riley, 1986, p.146(1770 的数据实际上是 1765 的)。1790—1910: Marczewski, 1965, p.LXX。

表 11.3 通过表示国家支出在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 (GNP)或全部商品生产中的百分比, 来调查这种可能性。

这里有一点我要指出: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估计甚至比支出数据更缺乏精确性。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最好的测量手段, 并且他们有时甚至会用国家间互不相同的基础来源进行分析测量。他们的数据收集了特殊的工业、地区或涵盖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销售或所得的数据。在这一时期估计服务部门的生产尤为困难。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面临这种困难时, 站在生产的角度上(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估计, 一些站在收入的角度上(国民收入)进行估计, 甚至还有一些人干脆把服务业忽略不计(商品生产)。这样, 除非差别悬殊, 国家间的比较是投机的。因为他们经常运用不同的方法, 我也谨慎地在一段时期内对不同组的估计进行了比较。因此这些数据不能为了特殊的目的而使用。庆幸的是总趋势是明显的。